

陆宗达 王宁

訓诂方法論

# 训诂方法论

陆宗达 王 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调查方法论

陆宗达 王宁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 × 1168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12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统一书号：9190·028 定价：0.89元

## 序

为了让更多的语文工作者和古代文献的阅读者不是只能接受前代或现代训诂家作出的词义训释结论，而能自己掌握一些方法亲手来解决一些古代文献中的词义问题，至少能够分辨某些结论的正确与错误，我们写了这本书，试图从原理上介绍一些前人使用过而行之有效的训诂方法，消除旧的训诂之学给人的玄虚奥秘的感觉，让训诂学能广泛应用。

这本书里所收的四篇文章，是有关训诂方法的四篇独立而又互有联系的论文。第一篇可以作为总论，后三篇是对“以形索义”、“因声求义”和“比较互证”这三个训诂方法的分论。而这三个方法彼此也是互相衔接，彼此关联，需要互相对照和结合使用的。这四篇文章中一部分初稿或初稿的片断曾在有些刊物或丛书上发表过。为了合成一书并构成完整的系统，加之在个别问题上事后又有些新的想法，在这本书中，对发表过的文章或片断也作了较多的增删修改。

训诂著作一向比较难懂。这主要是由于古代文献中的内容距离今天的生活较远，而过去训诂的着眼点又往往局

限于不常用的难字僻词上的缘故。在这部书中，为了使更多的读者读来不太吃力，我们较多地选用了古代汉语中常用字词作例子，有些例子还在不同的地方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解释，例子也尽量少举，以能说明原理为度。但是，由于论及训诂方法难免要引用旧的训诂材料，有时也不得不带出一些旧注释书和训诂专书的习惯用语，而这就足以让不是专门搞这一行的读者感到不习惯。这一点，以后还得进一步改进。

这本书中所用的术语，或沿用前人，或略作更改，或提出新术语暂且试用。为了避免如旧的训诂学一样产生术语不统一、涵义不清晰的弊病，也为了使读者了解我们所用术语的确切含义，书后附有《训诂学名词简释》，可对照本书参阅。

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里曾经谈到：“三种训诂方法必须结合起来使用，但在解决不同问题时，可以侧重使用其中的一种方法。究竟主要使用哪种方法更合适些，这要看提出的问题具备哪些方面的已知条件和需要首先探求哪方面的未知条件而定。”本书是对训诂方法加以解剖后的分论，不便举出各种训诂方法综合使用的例子。我们将在另一部书《古汉语词义答问》中举出综合运用训诂方法解决词义问题的各种实例，以补本书之不足。

训诂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训诂的材料浩如烟海，训诂大师们的经验丰富无比。要想从中抽取一些既符合语言

规律、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又为今人所急需的东西，确实是很困难的。加之我们对现代的中外词义学理论还学习得很不够，书中片面和错误之处一定不少，也有可能无法完全达到我们所预期的目的，恳切地希望得到专家和读者的指正。

作者

# 目 录

序 .....	1
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	1
《说文解字》与“以形索义”的训诂方法 .....	31
形义统一的一般规律和“以形索义”的适应 条件 .....	32
字与词的差异和形义关系的复杂性 .....	42
汉字的表音趋向和造形与用字的矛盾 .....	55
文字形体不断增多与古今字形的差异 .....	62
“以形索义”训诂方法的提要 .....	69
“因声求义”论 .....	73
“因声求义”是一项重要的训诂方法 .....	73
音与义的关系和“因声求义”的作用 .....	78
“因声求义”的特殊作用——探求名物的 来源 .....	85
“因声求义”要运用古声韵的研究成果 .....	94
语音变化的复杂性和“因声求义”材料的 广泛性 .....	102

音义关系的另一种体现——“以义正音” .....	117
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必须核证于古代 文献语言 .....	122
谈“比较互证”的训诂方法 .....	131
“比较互证”方法的重要性 .....	131
词义具有概括性与具体性统一、共通性与 民族性统一的特点 .....	134
词义运动的基本形式——引申 .....	139
词义引申是一种有规律的运动 .....	145
在引申系列中观察比较词义的异同 .....	161
用比较的方法验证和辨析词的意义 .....	168
附录：训诂学名词简释 .....	173



# 训诂学的复生、发展与训诂方法的科学化

## (一)

训诂学的萌芽大约始于东周，至今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最初的训诂不过是古代文献中偶或出现的训释形式，到了汉代，便发展为系统的、完整的注释书和训诂专书。但不论就著述的目的还是编写的方式来看，它都是经学的附庸，当时统称“小学”，内容包罗万象，与经典有关的无不毕载，严格地说，只是一项工作，还很难说是一门科学。

现在所说的训诂学，是传统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部门。它是随着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后来的语法学分工日益清楚，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之后而确立的。自从汉代刘歆的《七略》标有“小学”的名称以后，《隋书·经籍志》就将“小学”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宋代的王应麟在《玉海》里说：

“文字之学有三：其一，体制，谓点画有衡

从（按：即横纵）曲折之殊，《说文》之类；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尔雅》、《方言》之类；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

这个说法，是将过去所谓的“小学”统称“文字学”，并大致沿用了《隋书·经籍志》的名称，将它的内容分作体制（形）、训诂（义）、音韵（音）三个方面。这标志着“小学”已经脱离了经学，向独立的科学发展。经过清代“小学”鼎盛时期之后，晚近学者章炳麟（太炎），正式使用了“语言文字学”的名称，确定了其中包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三个门类。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才由此作了总结。

训诂学既然与文字学、音韵学作为三个并列的门类，它就必然有自己区别于另外两个门类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清代以前，文字重形、音韵重声、训诂重义的大致分工虽然已经确定，但是由于这三个门类在实践中确实很难分开，所以，在著作上和研究队伍上并没有一分为三，当然也就很少有人能从理论上对这三个门类的科学范围分别作出确切的规定了。到了近代，随着文字、音韵、训诂独立的理论研究不断丰富，特别是在高等院校文学院将这三个门类分别列为三个课程科目之后，三者内容交叉混杂的情况便不能继续下去了。训诂学同文字学、音韵学一样，便逐渐有了更为确定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这里，先介绍黄侃（季

刚)先生未发表的著述《训诂学讲词》<sup>①</sup>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黄季刚先生在《训诂之意义》一节中指出:

“诂者，故也，即本来之谓；训者，顺也，即引申之谓。训诂者，用语言解释语言之谓。若以此地之语释彼地之语，或以今时之语释昔时之语，虽属训诂之所有事，而非构成之原理，真正之训诂学，即以语言解释语言，初无时地之限域也。”

这个说法虽非训诂学的定义，却是对一切训诂材料最确切的说明，也是对传统训诂的目的和方式全面而概括的总结。宋代王应麟以及后来承袭他的说法的人，都是仅就《尔雅》、《方言》两书谈训诂，只提“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分”（按：雅俗之分包括标准语与方言、书面语与口语之分）。其实，这只是训诂的某种方式、某项内容，不能概括训诂的全貌。按黄季刚先生的说法，训诂即是词义解释之学，是用易懂的众所周知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或只有少数人能懂的语言。这就是两千多年来训诂实践的内容，它是很切合现在所保存的各种训诂材料的实际情况的。

在阐明训诂意义的基础上，黄季刚先生列出了训诂的

---

<sup>①</sup>《训诂学讲词》为黄季刚先生讲授训诂学的讲稿，当时由黄焯（现任武汉大学教授）笔录并整理。

具体内容<sup>①</sup>，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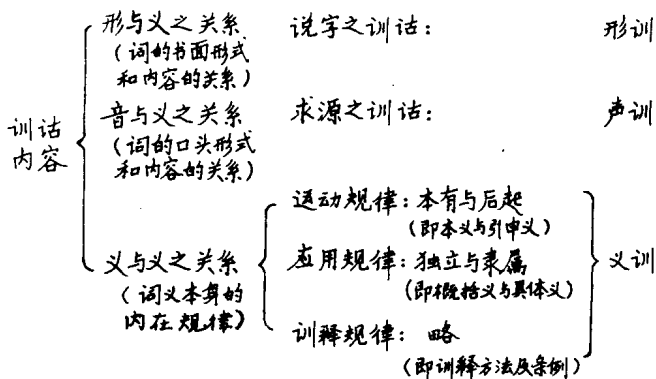
“本有之训诂与后起之训诂，

“独立之训诂与隶属之训诂，

“义训与声训，

“说字之训诂与解文之训诂。”

“本有之训诂”是讲本义的，“后起之训诂”则讲引申义。“独立之训诂”即“综合释义”，是讲词的概括意义的；“隶属之训诂”即“随文释义”，也就是讲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的。而训诂的方式，除解文的义训与求源的声训外，还有一种需要与字形贴切的训诂，也就是所谓的形训。这样，我们便可以根据他的说法整理出以下系统：



<sup>①</sup>黄季刚先生的《训诂学讲词》“训诂述略”部分，包括十个小部分。从这十个小部分看，黄季刚先生认为训诂可以从这四个方面分类。

这个系统，的确囊括了传统训诂的全部内容，也展示了与文字学、音韵学并列的训诂学应有的研究范围。照此发展，训诂学便会成为这样一门科学：

对象：古代文献语言（即古代书面汉语）的词义；

材料：古代文献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

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

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

## （二）

训诂学是汉语词义学的前身。但是，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的汉语词义学，比之语音学和语法学来，近几十年却大大落后了。且不说研究范围扩大的汉语词义学，只就以研究古代书面汉语为对象的训诂学本身，它沿着现代科学的道路向前发展的速度也非常缓慢。这种落后状态，主要表现在它的理论建设尚未真正完成。由于未能进一步科学化、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妨碍了它的普及，

因此，应用也只限于少数专门家的范围。它还不能很好地充当更多的人研究中国各民族古代历史、古代哲学、古典文学、各类科学史以及辞典学、考古学、中医学等科学门类的工具，更不能满足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的需要。

从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历史看，训诂学创始最早，而且成就也最高。它拥有一大批十分丰富的资料、许多有价值的著述。不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贡献卓著的训诂大师，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基础是很雄厚的。那么，造成这种落后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必须首先从几十年来我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状况来看。

从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发展到科学的语言学，中间经过一个引进的阶段。传统语言文字学中沒有语法这个科目，少量的语法材料是包含在训诂材料之中的。第一部系统的科学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是清代熟悉拉丁文的马建忠按照西洋语法的体系写成的，但它却成为汉语语法的创始之作。传统音韵学所以能发展到科学语音学的新阶段，则是与西方的普通语音学理论的影响、历史比较法的应用以及现代记音符号的使用分不开的。到了五十年代，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与早期的苏联语言学，又给汉语各部门的研究提供了带有指导性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总之，继承前人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促成了科学的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具体到语言的各部门，语法主要靠

借鉴，语音则是继承与借鉴兼而有之，词汇的研究情况又有不同。“五四”以来，国外的词汇理论也不乏引进，特别是早期苏联的词汇理论，介绍得比较多。但是，词汇是一种直接与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密切相关的语言要素，如果不通过对本民族语言的研究总结出规律和产生出理论来，只靠引进很难解决问题。因此，批判地继承传统训诂学的成果，对发展科学的词汇学或词义学，有着特殊的意义。

但是，训诂学与经学的密切联系，与考据学的息息相关，与古代文献中封建的文化、政治、哲学等内容的不可分割，都决定了它会在极“左”思潮的泛滥中，与它的相邻科学一起，受到挫伤。主张取消训诂学的极端论调，在一个时期内比较占上风。这些论调无非是说，过去的训诂材料，多半是对“九经三传”这些“文化糟粕”的解释，于发展今天的文化已毫无补益。而且，它虚玄、奥秘、多主观臆断而缺乏科学性，是不足取的。尽管持有这些主张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前代训诂大师在文献词义的训释、探求和整理上作出的大量成果经过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在今天仍令人信服，但他们却不愿把这些成就视为科学，总以为那些一个个的具体结论所以能够正确不过是一种巧合，是从感性材料中偶而获得的。这股思潮曾一度干扰了训诂学的提高和普及。

其实，这些取消训诂学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传统训诂学诚然是以古代文献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而古代用汉字记录的文献都是反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但语言对各阶级并无偏颇，不论古代文献的内容如何，它的语言都是当时的全民语言。那些因为训诂学研究的是“九经三传”便来贬低它、取消它的人，恰恰堕入了斯大林早已批判过的将民族文化与民族语言等同起来的谬误之中。斯大林说：“难道这些同志不知道，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民族语言既可以替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替社会主义服务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他还说：“他们没有看见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别，并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内容说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每个新时期而变更的，语言则在几个时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变的，同样地服务于旧文化，也服务于新文化。”（同上）这是一个在五十年代就已众所周知的语言学原理，早已无庸多言。更何况，不加分析地将“九经三传”一概目为“文化糟粕”，恐怕也不是对待古代文化的科学态度。

其次，古代文献语言虽然并非正在使用着的现代汉语，但是，却有着特殊的研究价值：

第一、在现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很多专业都需要阅读古代文献。由于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变化最频繁的因素，所以，阅读古代文献最大的障碍是词义问题。为了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的教学工作有理论、有科学方法指导地进行，收到最好的效果，也为了把古代文献中历来解释



不清的字句与篇章训释得准确、清楚，救活那些有实用价值却无人读懂的文献资料，就必须摸清古代书面汉语词义存在形式的特点和运动变化的规律。

虽然传统训诂学的研究范围比较狭窄，往往局限在上古经传和诸子，但我们又应当看到另一个现实，那就是古代书面汉语很早就脱离了口语，先秦的经传典籍对后代的书面语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后代文献中出现了一大批仿古的作品，它们仍然沿用先秦经典的语法和词义，而不顾及口头语言实际发展的状况。因此，古代书面汉语（也就是文言文）作为一种脱离了口语而存在的文献语言，虽然在个别地方不可避免地要受口语的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加入了当时口语的因素，但是，由于言与文的脱节，这种书面语在存在历史性的同时，还带有十分明显的综合性。例如唐宋八家的散文以至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作品中的词汇，仍然沿用《尚书》、《左传》的词义——其中有些词义在当时的口语中早已变化或消亡了。因此，就解决文言文阅读问题这个实用目的来说，把先秦书面汉语研究透彻，又是阅读后代文言文的重要根底。

第二、古代书面汉语是汉民族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而且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汉语。这种语言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中，最接近汉语的“源”的。尤其是它的词汇，几千年来或孳生新词新义，或发展旧词旧义，渊源大都离不开古代文献语言中的根词。所以，研究这一阶段的汉语